

探索“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办报路线

——重庆《新华日报》对《解放日报》改版的响应及其影响

陈 龙

摘 要:作为“不民主环境”下创办的“民主报纸”,重庆《新华日报》充分利用在国统区“公开工作”的“合法条件”,以“灵活变通”的坚忍举措应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压迫,较好地实现了“坚守阵地”和“增强党性”的动态平衡,充分发挥了扩大中共“政治宣传和政治影响”的独特作用。基于此,在中共指令党报普遍进行改版的背景下,《新华日报》在舆论上积极响应,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关于改版的决定;行动上以战斗性和群众性诠释党性,“倾听各党友人,各界先进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以“群众办报”自下而上推动报纸改版,选择性接受《解放日报》的改版经验,得到了中央的体察与默许,但也造成其办报经验被视作“支流”未被整体接受,而是在“缺乏全国性办报经验”的情况下选择性采用。然而,《新华日报》对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办报路线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后中共报刊在坚持政治性的前提下兼顾新闻性与经济性、不断取得突破与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与依据。

关键词: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重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党报改版;办报路线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0)00-0012-08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DJ013)

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唯一面向全国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充分发挥了扩大中共“政治宣传和政治影响”的作用^[1],被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其创始人博古赴延安后接办了毛泽东寄予厚望的《解放日报》,使重庆《新华日报》的国统区办报经验与赴延知识分子的新闻自由思想和《新中华报》《今日新闻》“重国际轻国内”倾向相互融合,形成了“不完全党报”的杂糅风格,为毛泽东耳提面命的改造为“四性一统”的“完全党报”。^{①[2]}1942年3月,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3]但是,《新华日报》并未办成和《解放日报》同一种模子,已成为学界共识。李金铨提出两者分别代表了白区策略和红区策略、都市派和农村派。^[2]陈晓静认为这种分型缘于环境差异,但都对中共党报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4]伍静关注到随着中共由农村走向城市,《解放日报》模式国家化,《新华日报》的传统则踪影全无。^[5]王雪驹等持不同观点,认为这两种办报模式经历了从冲突到调适的过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城市办报范式一直影响着中共办报实践。^[6]在毛泽东的明确指令下,为何《新华日报》改版形成了“党报的另一种传统”?《新华日报》对《解放日报》的改版举措究竟是照搬、冲突还是调试?“新华经验”对中共党报理论与实践是“一直影响”还是“踪影全无”?厘清《新华日报》如何响应《解放日报》的改版经验,无疑是解答问题的关键所在。

^①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华日报》的城市办报经验也属于“改造党报”的对象,所以博古才产生了“我们是在农村办报,这与在大城市里办报又大不相同,所以大城市里适用的有些方法,在我们这里不能照抄来用”的感触,这也是“新华经验”在一段时间内不为中共整体接受的历史根源之一。

一、以战斗性、群众性诠释党性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城市与农村的环境差异、公开与地下的迥异状态、革命与建设的不同导向,形成了“白区工作”与“红区工作”这两条路线,后者逐渐成为主流,导致“白区工作”的理论建构与经验总结落后于革命实践,一些做法在党内被批评为“合法主义”“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后,“白区工作”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要在新形势下做好“白区工作”,当务之急是明确指导思想,避免“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7]。1937年,中共在延安专门召开白区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此前“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反右倾机会主义”与“反‘左倾’机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要求各地同志……仔细的分析与研究各地具体的环境与各阶级力量分化的情况……正确的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画”,明确指出“为了进行公开工作,使公开团体能够存在,‘利用合法’是主要的,‘争取公开’是次要的。在群众革命斗争中,非法斗争是主要的,合法斗争是次要的”^[7],成为“白区工作”与“红区工作”采取不同策略的理论政策依据。

在“长期的秘密工作”后,通过与国民党的艰难谈判,中共得以公开发布全国性党报。在国统区“公开工作”的条件下,如何“利用合法”条件办报?中共形成了因地制宜、内外有别的宣传思想。^①对于“新的条件之下”建立的“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8],中共要求其守住阵地,“忍一时之快”,通过“打持久战”潜移默化地改变国统区政治导向、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以扩大我方阵地、削弱敌方阵地。^[8]据此,周恩来提出了“白区办报”的基本策略:一是“有理、有利、有节”,在斗争上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坚持原则,但方法机动灵活;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急,咄咄逼人。^[9]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凡是报道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揭露反动势力破坏抗战阴谋的,就坚决“有所为”,超出这个限度或一时不便说的事情,就坚决“有所不为”。^[10]现在看来,白区工作会议为《新华日报》独辟蹊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其灵活变通之举不致被视作“右倾机会主义”和妥协退让的表现,而是特殊环境下最大限度彰显党性的坚忍举措,在多数情况下得到中央的理解与体谅,可谓性命攸关。^②周恩来提出的极具操作性的办报策略,使《新华日报》在党组织难以深度介入的情况下能够对时局做出基本判断与恰当反应^③,而非事事等待上级请示。这些原则与操作层面指导思想的确立,无疑为《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之探索出一条有别于其他党报的“白区工作”办报路线。

但是,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中共创立以来,就十分注重党内思想、路线、方针的统一。为何在党内已存在“红区工作”办报路线的情况下,会形成另一种“白区工作”办报路线?胡乔木道出了个中缘由,“《新华日报》是一个民主的报纸,但创办在不民主的环境下”,难免会面临“很大的斗争”。^[11]虽然《新华日报》是中共机关报,但在国民党治下旗帜鲜明地彰显党性,易授当局压迫报纸之柄,不仅报纸及其工作人员会遭到迫害,连读者和广告客户都会受到威胁。由于“公开查封《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不好办的”^[12],国民党当局从配纸、发行、广告等方面全方位压迫《新华日报》,迫使其“自动”停刊。在思想上、舆论上严防死守,对其实行严苛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从头到尾均需遵检遵改,否则就会招来宪兵“坐镇”。在此“重点关照”下,“到1939年初,《新华日报》一、二、三版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必须区别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宣传鼓动工作:(1)党内与党外;(2)干部与群众;(3)公开环境与秘密环境;(4)战时与平时;(5)各种不同的区域(如大后方、抗日根据地、敌占区、城市、农村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05.)

^②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中共对“合法斗争”持反对态度,直到白区工作会议召开时,中共仍坚持“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因为合法主义要把群众的斗争降低到适合于国民党的法律”(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39)。《新华日报》处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遵守当局的法律。作为中共“合法斗争”的一面旗帜,如不能对这种变通之举予以“正名”,很可能在党内受到非议。

^③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如明目张胆地进行党组织活动,会为当局迫害报纸提供借口。故该报于1938年5月建立了党支部,但组织和党员都不公开。在此情况下,上级党组织也难以对该报予以事无巨细的指导。

的发言渠道,几乎被国民党当局完全卡死;新闻被磨去棱角,与一般报纸无大差别。”^[13]即便如此,在反击“投降主义”和“皖南事变”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新华日报》毫不退缩,采取“开天窗”、曝检、拒检等方式做斗争。据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统计,仅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半年间,《新华日报》稿件被扣94篇,删改156处,违检154次,可见双方斗争的激烈程度。^[13]在这种环境下办报,无异“石头缝里”求生存,《新华日报》既不能如国民党所愿,办成“类似《中央日报》的报纸”,而若像《解放日报》那样锋芒毕露,又可能失去来之不易的公开舆论阵地。在周恩来灵活的办报策略指导下,改版前的《新华日报》把握了尺度,虽多次被勒令停刊数天,仍能维持公开定期出版。

1942年3月,中共系统总结《解放日报》改版经验,对改造党报提出五点指导意见,首次规定办报的基本原则,要求党报必须具备“党性”“群众性”“指导性”与“战斗性”,以“党性”为第一要义。10月,毛泽东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学习西北中央局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将《解放日报》改版经验推向全党。在“整风运动”推动下,各根据地报刊纷纷仿效,身处国统区的《新华日报》虽承担特殊使命,也不能置身事外。早在1月11日,潘梓年就在代论中提出:“提高党性……就是提高自己的战斗性与战斗能力”^[14],将“增强党性”阐释为“提高战斗性”,既呼应了改造党报原则之一的“战斗性”,又避免报纸在国统区冒险彰显“党性”。此后,《新华日报》延续了这种思路,在宣告改版时将“党性”阐发为“增强群众性”。在“党性”被钳制难以充分彰显的情况下,通过“反映群众”实现“保持党性”与“利用合法”的平衡,无疑是一种巧妙的策略。作为有志于“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的政党^[15],中共报刊的“群众性”自不必说;作为此时执政的国民党,也无法公然对《新华日报》的“群众性”口号表示反对。

从更深层次而言,“群众性”也是实现“党性”的前提。媒介不能影响一个不使用媒介的人,在受众对媒介的使用过程中,媒介的内容才会被消费,实现其某些功能。^[16]既然是“公开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就必须与国民党党报、商业性报刊争夺受众。因此,《新华日报》在创刊伊始就开设“大众信箱”:“我们有一个理想,就是做到读者们都替本报写文章”,呼吁“做工的,做庄稼的,店铺里的伙计,军队中的兄弟,都来给本报写稿”。^[17]此后进一步形成“本报之为党报,绝非我党包办之报”的理念^[18],开辟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友声等专栏,为这些读者成为作者提供空间,反映群众的话语与心声。^①“群众办报”与“名家办报”的实践,丰富了报纸的内容,改变了党报的严肃面孔,满足了城市读者在信息、文娱等方面的需求。不仅如此,《新华日报》重视吸纳读者意见,通过组织座谈会和读书会密切与读者的联系、不断改进报纸工作。在创刊两周年之际,《新华日报》通过启事在编辑方针、版面编排等各个方面广泛征求意见。自此,每逢创刊周年征求读者意见成为《新华日报》的重要传统。这些充分表明,《新华日报》对“群众性”的实践是真诚而又不自满的,确实起到了“改造党报”的重要作用。

二、自下而上推动改版工作

1942年3月,毛泽东指示《新华日报》进行改版。鉴于所处环境,如照搬《解放日报》改版经验,以“增强党性”统领改版工作,势必激起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升级;若对该指示置之不理,就违反了“党管党报”的组织纪律。为此,《新华日报》部分吸收了《解放日报》增强党性、反映群众的举措,保留了自身内容策略、技术形态、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优点,形成了有别于“延安范式”的风格,为中共办报模式的演进开辟了另一种可能。在此过程中,《新华日报》表现了较高的政治敏感性,早在1941年10月就转载《解放日报》社论,强调“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更加

^①《新华日报》认为“群众办报”与“名家办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提出:“出名的作家可以把各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写出有系统的文章,这是普通民众所不能的,但每一个普通民众可以写出他自己那小范围内的具体生活与工作经验,这又是一个著名作家所不能的。只有工人、农民、店员、兵士、学生将他们所想的都写出来,我们的报纸才能真正反映出全国在抗战中的动态。”(参见杨放之. 我们的信箱. 新华日报, 1938-01-11.)但总体而言,《新华日报》办报的主流仍是“名家办报”,这也是此后中央批评该报“反映群众”不够的根源之一。

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19],表达了对“整风运动”的拥护态度,反应速度超过了许多根据地报刊。从1942年4月19日起,《新华日报》先后转载毛泽东撰写的《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稿,在周恩来领导下于5月23日开展整风改版。

9月18日,《新华日报》在改版社论中公开检讨没有充分具备中共党报的品质、发挥人民大众喉舌的作用,坦承既受制于“客观环境的困难”,也缘于“主观努力”不够,希望从贯彻党的政策和反映人民呼声着手,做到不仅是中共机关报,也成为人民的报纸。^[20]对照《新华日报》的改版社论《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与《解放日报》改版经验总结文件《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两者都关注到引用外电较多、反映群众较少、文字不够通俗的问题,但《新华日报》并未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贯彻党的政策;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和观点争论,加强思想斗争”,对于“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的要求仅限于“登载党的政策、方针和一些负责人的文章”并加以阐发,体现了《新华日报》鉴于“环境的困难”对上级精神的灵活变通。其“主观努力”的方向,是公开号召读者“予本报以全面批评”,认为整风“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倾听各党友人,各界先进和广大读者的批评”。^[21]相较而言,《解放日报》改版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推动^①,《新华日报》“自下而上”的动员既壮大了改版声势、紧扣了“联系群众”的改版主题,也为其灵活变通的改版举措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即顺应“人民的选择与呼声”。

中共对于改造党报的要求,归结起来有两点:增强党性、联系群众,《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各有侧重。在增强党性方面,《解放日报》的措施是接受整风运动教育、不换脑袋就换人;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22];报社与党委会议互派代表,建立由内到外的审查制度,避免“闹独立性”。而《新华日报》的措施是刊载整风运动文件,以正面教育为主^[1];对于革命事业要有坚贞不二的忠诚,对于外来的任何苦难要能勇敢不馁的去迎接、去克服^[14];通过制定科学的工作制度和严明的奖惩条例,在小组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工作人员的党性修养与战斗性。在联系群众方面,《解放日报》以行政命令打造一支覆盖“党政军民学”的撰稿队伍,解决本地和边区新闻的稿荒问题;以“点将”的方式向文艺人士布置“命题作文”,改变副刊内容与导向^②;将版面安排由“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改为“一本地、二边区、三国内、四国际”,以宣传党的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动态为主。《新华日报》则提出“眼睛首先看到的是读者”“人民勤务员”等观念,鼓励报纸的读者都成为作者,吸收党外人士办报;按照读者意见改进工作、为读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推广白话文写作,推动内容通俗化;增加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与建设的介绍,更有领导有计划地反映国统区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与要求。不难看出,《解放日报》改版主要着眼政治层面,而《新华日报》则倾向业务层面。两者都加大了对根据地的报道力度和对群众生活的反映力度,不同之处在于《解放日报》强调的“党性”被《新华日报》阐发为“战斗性”,“不换脑袋就换人”的做法柔化为“以正面教育为主”;《解放日报》以行政命令扩充撰稿队伍,《新华日报》则“嚶嚶求友”。可见,《新华日报》并未照搬《解放日报》的改版举措,可谓“有限改版”。

对此,中共持何种态度?从现存史料来看,多数情况下中共能够体察《新华日报》的两难境地,看重其作为公开舆论阵地的战略意义,体谅其“伪装”与“变通”。陆定一形象比喻:“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的”^[23],毛泽东也给予了该报“一个方面军”的评价,肯定了《新华日报》在艰难处境下的办报成绩。但“方面军”终归不是“主力军”,不能代表中共办报实践的正统。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致电董必武,基于“《新华》在险恶环境下”的体察,明确了《新华日报》“在大后方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

^①《新华日报》这种“自下而上”的做法在边区也不适用,边区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难以发动其对报刊工作予以关注和批评。

^②为建好副刊这块文艺阵地,毛泽东亲笔起草《〈解放日报〉第四版征集办法》,为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下达了以党建、文学、历史、美术、文化、戏剧、教育等为主题每月5000—15000字不等的写作任务,避免“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的问题再次发生。

不是党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办报方向,肯定其“想出许多方法奋斗,并保有今天的销路,是有成绩的”;但也提出“既是党报,则环境若何困难,总不要违背党的方针”,指出该报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国民党的“大捧”和“头条大题”,“使国共在群众中无所区别”;二是“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三是“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议论太多”,应多反映群众、多刊登群众稿件并对稿件加以审查,要求“以上意见请先在领导同志中研究,如同意则请据此作详细检查与具体改革计划,然后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展开讨论”^[8]。可见其并不认可《新华日报》的改版成果。董必武在复电中将《新华日报》产生错误的原因归结为“政治警觉性不高;整风运动未能深入,未深刻研究毛主席文件和思想;编辑上的组织不周密,阅稿与检查皆有漏洞”^[8],换言之就是没有照搬《解放日报》的改版经验,这种认识不可谓不深刻。

即便如此,复电只是笼统表示要“广泛动员”“检查报纸”“进行检讨”,并未提出具体整改措施。这表明,《新华日报》并非不能理解《解放日报》改版的政治逻辑与完整内涵,而是主观上没有照搬的意愿。《解放日报》创办之初受《新华日报》的“城市办报”经验与赴延知识分子的“知识气质”影响,尚需毛泽东半年多的耳提面命、不断鞭策才彻底改造。作为“城市办报”经验的母体,《新华日报》的“不完全党报”因素更加根深蒂固。不经过“整风运动”的疾风骤雨,很难全面接受《解放日报》改版经验,放弃在国统区已获成功的办报模式。特别是《解放日报》改版的主题“增强党性”对《新华日报》可谓“性命攸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鉴于此,中共默许了《新华日报》作为“另一方面军”的办报实践,但也造成其并未达到“完全的党报”标准,无法成为中共办报模式的主流。概而言之,《新华日报》对《解放日报》改版经验并非“全面照搬”,也未与之发生“冲突”,在吸收党外人士办报、推动“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等方面对其还有所贡献,不是一种被动的“调适”,而是主动的“选择性接受”。正因如此,中共对“新华经验”也只是“选择性借鉴”和“保留性评价”,而不是整体认可。

三、探索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党报姓党”是党报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党报也需要尽力争取受众,其力量的大小,大体上可以用读报人的数量多少来衡量。^[24]如何处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中共经历了漫长探索过程。在初创时期,中共就意识到“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15],此后将群众基础进一步扩大到“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25]受限于智识者为主的党员结构和“思想的团体”的自我认定,中共将自身与群众的关系定位为“头脑”与“身体”^①,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26],导致有读者声称中共机关报《向导》是资产阶级读物,不仅看不懂,也买不起。^[27]1926年,中共改变思路,提出:“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28]但改变“俯就民众”姿态而非重塑报刊内容,并未彻底消除中共报刊的“知识气质”。“在中国这整个的‘贵族文学’的制度下,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的话说得更通俗,没有办法写得使每一个苦力都懂”的认识^[29],造成“群众对于这种宣传感觉空远不能唤起他很深的注意,习久且生厌恶心理摈而不看”^[28],导致中共难以与工农阶级紧密结合,获得足够的党力和声威。在中共开辟根据地之后,“只此一家”的优势地位,使得根据地报刊较少考虑争取受众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为领导干部开展工作服务。

对于《新华日报》而言,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是其首要任务,故其“创刊八年来,一贯就是以人民的报纸为方针,为努力目标”^[30]。这种办报理念的施行,源于《新华日报》对“党性”与“人民性”逻辑关系的深刻体悟,认为中共要求全体党员忠实地为人民服务,那么成为人民

^①中共“二大”指出:“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0)

的报纸也就是执行了党的主张。较之根据地报刊,这种阐释无疑带有浓厚的“新华”色彩。虽然改造党报既要“增强党性”也要“反映群众”,但对广大根据地报刊而言,“反映群众”是“增强党性”的途径^①,主要表现为加大对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反映力度。承载党建与统战双重任务的《新华日报》,则通过鼓励群众投稿、征求群众意见、依靠群众办报来“反映群众”,以此“增强党性”,形成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观念,造成两者的改版路径存在差异。

率先实践“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观念,是《新华日报》对中共办报实践的独特贡献。1942年,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31],表达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由于边区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根据地报刊在增强“党性”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建构,但“人民性”方面只能“反映群众”而非“群众办报”,导致其“惯于直接代党政机关发言,进行自上而下的指导”^[32],民众普遍认为党报“只是给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看的”,使得党报在“群众中缺乏基础”。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社论提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33],将报纸的改版原则定为“群众办报”。联系1945年12月胡乔木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观点“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报纸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30],不难发现《人民日报》与《新华日报》办报思想的一脉相承。由于《人民日报》改版很快中断,该方面的探索一度降温。直到20世纪80年代,曾参与《新华日报》创办、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胡绩伟重新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观念,引发了广受关注的“党性与人民性之争”,充分体现了《新华日报》对中共办报实践的深远影响。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申“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经过80载风霜磨砺的《新华日报》办报理念,终于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四、余论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经验”对中共办报实践是“一直影响”还是“踪影全无”?相关言论和史实表明,中共对《新华日报》的“城市办报”经验,经历了“选择性借鉴”到“逐步认可”的艰难历程。1949年,周恩来提出:“入城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按解放前那样当然不行,办成解放区那样,读者也会不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34],言下之意是走出“山沟沟”之后,应大力推广“城市办报”的经验。毛泽东则强调:“不要因为进城办报而忘了农村”,仍将“农村办报”作为中共办报实践的“出发点”。^[35]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报企业化经营探索过程中,中共对于党报经营管理与经济核算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新华经验”被整体接受,并取代了“延安范式”的主流地位。虽然中共意识到“过去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更加不能容许其继续下去”^[8],《人民日报》进城之初也提到“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在城市办报的经验”。^[32]但中共仍强调“我们的报,主要地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主要地是反映党的政策和战争、生产、支前、工农兵生活等”^[36]。相较而言,毛泽东显然更加信任在延安经过“整风运动”考验与筛选的报刊工作者,更加推崇亲自指导而成的“延安范式”,这决定了中共不会照搬《新华日报》的城市办报经验,而是在“缺乏全国性办报经验”的情况下选择性地采用。

1985年,穆青提出:“现在我们新闻界有许多同志推崇而且极力地宣传过去在国民党时期办报办得如何好……解放后我们取得了政权,成了执政者,这和在美国的高压政策下面办报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仍把(《新华日报》)对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那套作法搬过来,那就大错特错了。”^[37]这种言论的背后蕴含着改革开放初期“新华经验”与“延安范式”的冲突,揭示了“新华经验”再度进入中共的视野。改革开放前中共报刊的发展历程,似乎证明穆青的观念才是中共看待“新华经验”的主流。但是改革开放后的事实表明,《新华日报》形成的“城市办报”经验,在中共办报史中具有不可磨

^①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阐述了对该指示的理解:“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可见,“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增强党性”。

灭的地位,其对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率先实践以及重视报纸的业务水平、技术形态与经营管理的做法,为中共报刊在坚持政治性的前提下兼顾新闻性与经济性、不断取得突破与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与依据。

参考文献:

- [1] 石西民,范剑涯.《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25;234.
- [2] 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79;20.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93.
- [4] 陈晓静.延安办报与重庆办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政治动员比较研究(1942—1945).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2.
- [5] 伍静.党报的另一种传统:延安《解放日报》与重庆《新华日报》的比较及不同命运.新闻记者,2015,11:49.
- [6] 王雪驹,楚航,王润泽.城市办报范式与党报理论的冲突与调适:对整风运动中重庆《新华日报》改版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8,8:141.
- [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34;232,237-239,243,250.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86;90;137-138;139-140;302.
- [9] 王占阳,王小英.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一代中共领袖.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330.
- [10] 胡长明.大智周恩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232.
- [11]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93.
- [12] 刘立群.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纸张从何而来.党史博览,2007,2:24.
- [13] 廖永祥.新华日报史新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71;98.
- [14] 潘梓年.提高战斗性:为纪念本报出版四周年.新华日报,1942-11-01.
-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90;122.
- [16] 尹韵公.生动展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魅力.光明日报,2011-08-30.
- [17] 我们的信箱.新华日报,1938-01-11.
- [18] 本报发刊五周年.新华日报,1943-01-11.
- [19] 加强党性锻炼.新华日报,1941-10-05.
- [20] 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新华日报,1942-09-18.
- [21] 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新华日报,1942-05-23.
- [22] 博古.党与党报.解放日报,1942-09-22.
- [23] 陈清泉,陶铠.陆定一新闻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71.
- [24] R. E. 帕克, E. N. 伯吉斯, R. D. 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8-79.
- [25]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197.
- [26] 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序言3.
- [27] 冬原.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向导,1926-08-06.
- [28]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202;202.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37-138.
- [30] 胡乔木.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1945-12-30.
- [3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8.
- [32] 李庄.四十年间三大事.新闻战线,1988,6:10;9.
- [33] 致读者.人民日报,1956-07-01.
- [34]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588.
- [35] 安岗.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机关报.新闻战线,2008,6:22.

[36] 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18.

[37] 穆青. 穆青论新闻.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302-303.

Explore the Newspaper Route of Unification of the Party Spirit and People's Nature: The Response of Chongqing Xinhua Daily to the Revision of Liberation Daily and Its Influence and Effect

Chen Long(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democratic newspaper founded in an undemocratic environment, Chongqing Xinhua Daily made full use of the legal conditions for open work in the Kuomintang area and responded to various oppressions of the Kuomintang authorities with flexible and persevering measures, achieved a dynamic balance of holding ground and enhancing the party spirit, which has given full play to the unique role of expanding the CCP's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nfluence. Based on th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CP's order to revise the party newspaper, the Xinhua Daily responded positively in public opinion and clearly supported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revision; interpreted the party spirit in a combative and mass manner, listened to the criticisms of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friends, prominent citizens and readers, promoted the revision of the newspaper from the bottom up by the masses run newspapers, and selectively accepted the revision experience of the Jiefang Daily, which has been understood and acquiescence by the CCP's Central Committee, caused its experience to be regarded as the tributary of the CCP's newspapers, selectively adopted in the absence of national experience in running newspapers. However, the Xinhua Daily's explora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has provid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basis for the CCP's newspaper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ws nature and economics under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political nature and to continuously achieve breakthroughs and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 Words: unification of party spirit and people nature; Chongqing Xinhua Daily; Jiefang Daily; party newspaper revision; newspaper route

■ 收稿日期:2019-12-15

■ 作者单位:陈 龙,暨南大学传媒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632

■ 责任编辑:汪晓清